

城市公共空间建设与城市文化发展^{〔*〕}

——以广州与岭南文化为例

○ 柳立子^{1,2}

(1. 暨南大学 历史地理研究中心, 广东 广州 510632;
2. 广州市社会科学院 哲学文化研究所, 广东 广州 510410)

〔摘要〕城市是人的行为塑造的结果,同时又反过来塑造人的行为。城市公共空间作为最反映城市的文化特色和文化品味的重要部分,具有特殊的文化价值。中国的城市公共空间从民国初年发展至今,在对城市文化的表现和发展方面经历了曲折反复,现在又被提到了理性论证发展的关节点。本文以广州为例,试图阐释城市公共空间一方面应承担起展示宣传岭南文化的重任,另一方面应不遗余力地促进和推动现代岭南文化的持续进步发展。

〔关键词〕城市公共空间;文化价值;城市文化;广州;岭南文化

一、城市公共空间的文化价值

城市作为社会文明的重要标志,是人的行为的塑造结果,同时又反过来塑造人的行为。在不同国家、民族和不同区域的城市社会空间环境下,人们行为的不同造就了不同城市间城市社会空间结构样态的差异,也造就了城市社会空间文化感知意义的差异。

有学者指出:“都市的建设从社会学的意义上讲主要是公共空间的建设”。^{〔1〕}我们不妨把“城市公共空间”定义为,由公共权力创建并保持的、供所有市民不受限制地自由出入、自由使用和自由交流的场所和空间,既包括公共的体

作者简介:柳立子,暨南大学历史地理研究中心博士研究生,广州市社会科学院哲学文化研究所副所长、副研究员,研究方向为珠三角历史地理和岭南文化。

〔*〕本文系广州市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之“世界文化名城建设与文化产业重点研究基地”资助项目的研究成果。

育馆、博物馆、图书馆、火车站、汽车站等室内空间,也包括广场、公园、绿地、街道等室外空间。于是,城市公共空间作为构成城市庞大系统的重要元素,作为最反映城市的文化特色和文化品味的重要部分,不仅应具有优美的环境和丰富的物质表现形式,更应该是吸引公众兴趣、凝聚城市活力,为城市居民提供精神、文化与感知方面交流与互动的场所和平台。具体来说,一个城市的公共空间文化价值的构建与表达主要通过以下因素来体现:

(一)与自然环境的协调性

任何一座城市都是在改造自然环境的过程中逐渐发展形成起来的。城市公共空间的构建上,应充分考虑地形、植被、水体的自然形态、自然景观构成和气候特点等,应充分考虑与当地特点适宜的材料和技术的应用,因地制宜、顺势而建地构建公共空间与自然环境间的亲和关系,尽量实现公共空间与自然环境间的和谐之美。

(二)以人为尺度的适宜性

“城市最基本的特征是人的活动”。人作为城市的主体,城市公共空间的设计只有以人为本,适应人的尺度、速度和舒适度,公共空间的活力才能充分展现出来。公共空间建构时,如果对人的需要和感受漠不关心,只关心所谓现代的气派和形象,人们无法从中得到身心愉悦的享受,城市公共空间的设置将变得毫无意义。

(三)城市形象的表征性

城市是特定人群发展到特定阶段的产物,任何城市都会在诸多方面形成属于自己特有的东西,包括特色建筑、特色风物,以及重大历史事件遗迹等,也包括城市发展过程中形成的生活习惯、意识表征等,既在特定的城市空间中产生形成,也对城市空间产生影响。城市公共空间作为城市的象征,应体现所处时代的时代特点、文化观念和审美心理,更要反映出所在地域及民族的文化形象和文化特征。

(四)历史发展的承继性

城市始终处于不断地新旧交替之中,永远没有最终的完成体。作为城市环境质量和景观特点再现的公共空间也是如此,总是在不断地发展变化之中,并随着人类的技术经济条件、社会文化发展及价值观念的变化,不断地创造出更新更美、更具文化艺术内涵的公共空间。然而,无论城市的历史变迁有多大,历史的脉络总应该印记在城市公共空间中,城市发展过程中文化传统、建设成就,以及重大历史事件和重要历史人物等等,都应该能够被作为人们的集体记忆符号,在城市公共空间中找寻出痕迹。

(五)城市文化的多样性

列宁说:“城市是经济、政治和人民精神生活的中心,是前进的主要动力。”^[2]城市公共空间受社会多重因素影响,不同的社会、经济、民族、地域、自然环境形成人类不同的文化、历史以及不同的生活方式和空间形态,在城市中客观

存在并相互作用着,从而造就了丰富多彩的城市文化,也造就了城市丰满多元的文化魅力。城市公共空间的建造,公共空间文化意涵的建构,必须将城市文化的多样性予以充分反映。

(六)城市风格的整体性

城市发展是社会变迁的历史,又是一部城市艺术史。无论是作为城市公共空间硬质界面的各类实体建筑,还是与实体建筑紧密相连、作为重要过渡的街道、绿地,亦或是对这些实体空间的“软装饰”上,都应该充分顾及其间在体量、形式、质感、色彩等方面的协调和整体之美,将不同历史时期思想、文化的沉淀完美融合,塑造出城市自身风格鲜明的整体形象。

二、中国城市公共空间建设回顾

(一)公共空间初创,城市文化精髓尽显(民国初年至新中国建立)

古代的中国城市,公共意义上的任何人都可享受、可介入的城市公共空间基本不存在,所有的空间都是有等级价值的,在不同的空间里,通过政治、经济、宗教和地域文化的约束,使得一定的社会空间仅属一定阶层或一定的人群。^[3]比如,中国的城市园林有着三千年的历史,从秦汉时期开始,历经唐宋成熟期、直到明清高峰期,都表现出有很高的艺术水平,但都属于皇家苑囿和朝贵私园。辛亥革命后,随着皇家禁苑的陆续开放,公共设施的逐步规划兴建,中国的一些城市开始或多或少地出现公共园林、公用绿地和公共博物馆等城市公共空间。广州作为中国较早出现城市公共空间的城市,1884年张之洞在广州实学馆的基础上建立了中国最早的博物馆;戊戌变法前,梁启超和其他改良派一起建立了“万木草堂书藏”,开启了广州近代图书馆事业的重要尝试。^[4]1918年10月,广州设立市政公所,大范围拆除城墙、拓建公园、建设骑楼街道,近代广州的公共空间建设拉开序幕。这对城市人民的生活产生了重大的影响,并且无论是在建造过程的理念遵循上还是建成后的效果呈现上都体现出强烈的时代特征和文化意涵。

(二)公共空间统征统建,政治意味浓烈(新中国建立至改革开放)

新中国建立后,高度集权的计划经济体制的建立,推行“全国一盘棋”独特的政治、经济发展模式,加之社会主义全面学习苏联城市规划思想,城市公共空间建设以服从庆典、游行、备战等政治需要为其主要目标,追求严谨的政治秩序。各级政府统征、统建,模式单一,全国各地建了不少体量庞大、内容空泛的中心广场和公园。相比之下,对城市公共基础设施和生活设施却重视不够,城市街道、公园等公共空间的生活功能弱化不少。这种否定市场和力量,主要由非市场因素来决定的城市公共空间建设,无疑与经典的城市公共空间模式产生了较大的偏离。

(三)公共空间大拆快建,文化特征不鲜明(改革开放至今)

十一届三中全会后,生产力的发展得到极大解放,中国城市得以迅速发展,城市公共空间格局发生大变化。80年代,一些大城市基本选择在城市中心区见

缝插针地进行局部拆迁式改造,原有的一些公共空间被占用、街道被阻断,建筑密度大大提高,城市景观延续性被破坏。90年代,随着房地产市场的建立,不少城市对开发价值高的城区大面积拆建,价值不高的区域则无人问津、日益残旧,这种不讲究历史文脉的大拆大建在全国范围内大规模推开,从南至北千城一面,对城市景观造成强烈的冲击。广州作为改革开放的前沿城市,其公共空间受到的“诟病”非常有代表性:新老建筑交错并列、杂乱无序,缺失必要的过渡,文化内涵无从表达。到2000年以后,广州开始在新城区大量建设公共空间以求弥补。然而,由于对城市历史空间结构、形态肌理和环境文脉缺乏整体研究,规划设计空间处理简单粗糙,单体建筑又盲目片面地追求形式,导致广州的公共空间难以给人带来愉悦感和舒适感,城市丧失了传统生活气息和岭南特色,给城市的公共空间文化意涵的延续发展带来难以挽回的损失。

三、城市公共空间建设应体现城市文化特色

在物质愈益丰富和科技高度发达的现代社会,城市公共空间往往呈现出现代主义“重物轻人”的倾向:汽车充斥的高速路,超高尺度的摩天大楼,适宜行走和活动的空间越来越少;城市越扩张,离自然越遥远,城市就意味着混凝土“森林”;历史遗迹、历史街区被拆除或被“淹没”,很多城市一眼望去都是宽直的马路和崭新的建筑,几年时间就能改变得电子导航仪都迷失方向。实际上,这种割断了历史传统和文脉的所谓现代气派和形象,往往牺牲了城市公共空间应有的社会特质,让人们感到的是深深的失落,完全无法让人从中得到身心愉悦。现代城市公共空间的设计和建设,应该面向城市公众,应该体现城市文化,应尽可能地为市民大众提供与他们文化特质相符合的人性化公共空间。下面以广州与岭南文化为例阐释城市公共空间建设应从何种角度体现和反映城市文化特征和需要。

岭南文化是在以广州为中心的岭南大地上发展起来的地域文化,她在岭南地区孕育、诞生、成长、壮大和成熟,深受岭南地理环境和人文环境的影响,富有岭南特色。虽然久经沧桑,其内容因时代而变迁,但它所固有的以人为本、开拓创新、开放兼容的文化特质与风格,在全国区域文化之林中独树一帜,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更被注入新的生机和活力。同时,岭南文化作为一种学术源流或派别,在政治、哲学、戏剧、音乐、绘画、民俗、医药、园林、建筑等各个领域,都有自己的建树和支脉,^[5]覆盖和延伸到我国学术文化园地的各个角落,并结出丰硕之果。几千年来一直作为岭南地区政治、经济、文化中心的广州,必须承担起展示宣传和弘扬发展岭南文化的重任。在广州城市公共空间的建设上,应当充分贯穿岭南的人本哲学思想观点和朴素自然的审美意境情趣,充分运用岭南的文化艺术元素、特色风俗物产和民间工艺技术,充分体现能够唤起人们关于城市记忆的一些重大历史事件和历史人物,使市民和游客都能够感受和体会到岭南文化意涵的魅力和张力。

(一)以岭南文化的人本哲学观为统领

岭南文化是一种原生型、多元性、感性化、非正统的世俗文化。其哲学观是人本主义,其道德观是快乐主义,其价值观是实用主义,其认识观是感觉主义、经验主义。^[6]它强调人在宇宙中的地位和作用,突出人的主体意义,突出人的价值和追求。它的聚焦点不是皇宫贵族,不是官吏军勇,也不是富翁商贾,而是百姓平民。岭南文化认为,人的行为无论缘于人的本能,还是缘于人的思想,其获得幸福的愿望,包括感性和理性的欲望,都是合理的、无可指责的,因为它符合自然法则,也体现了人性要求。岭南文化这种重务实,崇实效,求实用的思维模式,直接形成了岭南人面对现实,重视实干,讲究实用,追求实利,反对空谈的文化传统。这种文化传统不仅是社会平民的潜意识,而且深植于社会的精英阶层,使得上层社会的思想追求表现出强烈的感觉主义、经验主义的倾向。从汉代陈钦、陈元父子与士燮“一门四士”为代表的经学家,“先帝后帝各有所立,不必其相因”的观点,“学问优博,又达于从政”的贡献,遵从的都是做学问不应因陈守旧,应因时而异,应重实在、重创造、重应用;到唐代禅宗惠能倡导中国佛教要从关注佛法义理转向重在当下的修行,提出“佛法在世間,不離世間覺,離世覓菩提,恰如求兔角”的思想,主张佛教徒修持的注意力转向现世人间;再到陈白沙开创的以“学贵乎自得”、“以自然为宗”为主要内容的江门学派,陈建、黄佐的“知本务实”的思想,朱次琦、陈澧开拓近代先河的“务本开新”的理论以及近代郑观应、康梁、孙中山等无不把目光投向现实,寻找解决现实问题的良方。人本哲学作为岭南文化的灵魂,贯彻于岭南文化的始终。

广州在进行公共空间建设时,应深入领悟和彻底贯彻作为岭南文化重要“红线”的人本哲学观,以能满足人的需要为出发点和落脚点,注重打造舒适宜人的公共空间环境,注重表现富有活力的空间特征和环境气氛。扬·盖尔在《交往与空间》中提到:“人们的相互交往和丰富的激情感受构成了富于生气的城市生活,调查和分析表明:人及其活动是最能引起人们关注和感兴趣的因素,建筑外部空间的室外生活和活动比空间和建筑本身更根本,更有意义”。^[7]广州民国时期中心城区以骑楼为主要建筑形式的传统文化商业地区,就是以以人为本为最核心思想构建的充满人情味和城市活力的优秀代表作。原本是广州近代大规模城市改造运动的改良型方案,却因为秉承对中国古代建筑文化的传承与创新的同时,嫁接了西方古典建筑的输入和演化,体现出对自然、社会和人文的适应性,其间折射出强烈的地域性审美心理,将岭南文化的精髓演绎到极致。而近些年广州新建的许多现代城市公共空间,例如天河商圈地区,由高楼大厦、地下停车场和繁忙的机动车交通构成,各建筑物和功能区之间相距很远,步行交通困难,而且建筑物附近供外部逗留的公共空间条件很差,迫使人们尽可能迅速地穿越这些区域地带,而不是去体验身处其中的愉悦感受和文化乐趣,这显然有些偏离了人的尺度,公共空间显得大而不当,市民和游客很难体会城市的人情味和文化品位。美国学者雅·简各布斯曾指出城市改造容易出现两种倾向:一种是

采用完全形式化的建筑布置和形成广阔的开敞空间;另一种是高楼林立的建筑空间余留下的消极空间,两者都是非人性的。^[8]所以,广州今后的城市公共空间的建設应以“人·社会·环境”为核心,注重城市设计的人本精神,以不断适应发展变化的居民生活结构和提高城市品质为目标,综合考虑自然和人文要素,强调包括生态、历史和文化在内的多维复合空间环境的塑造,努力创造富有人情味、场所感和地域感的空间环境。

(二)以岭南文化朴素自然的审美意境作为风格定位

在城市公共空间的建設规划设计中,一座城市应有自身统一的风格特色。有主题的城市公共空间容易加强城市的识别性,形成城市的文化意象,从而产生较强的归属感和场所感,使市民和游客更好地感知和认识城市形象和文化底蕴。广州的自然地理位置和气候条件,使广州人喜欢户外生活,居住和工作都愿意选择既出行方便而又亲近自然的环境。古代广州城就是“青山半入城,六脉皆通海”的布局:城内的白云山、与城北明代城墙相连的越秀山、城墙外的番山、禺山、东山、西山,使广州古城内融入相当面积的青山绿地;古代珠江是非常辽阔的,又有海潮涌入,故当地人 not 称珠江而称“珠海”,过江称“过海”。从白云山留下来的甘溪和文溪穿城而过,南汉后凿池形成芝兰湖、西湖、菊湖等,与双溪连通,而后又形成六脉渠,溪水最终汇入珠江。古城通过对山体和水体的充分合理利用,使整个城市生活空间融入了轻快、活泼而又优美的自然景观环境。广州人对“朴素自然”的审美追求还集中表现在岭南园林的风格上,其以清新旷达、素朴生动取胜,造园构意新颖,布局平易开朗,不似北方园林之壮丽,也不似南方园林之纤细,追求一种通透典雅、轻盈畅朗的独特格调,成为与江南、北方鼎峙的三大地方风格之一。可见,广州人对“朴素自然”的追求是一贯到底的,是独具自身风格的,也是颇具文化韵味和意涵的。

广州的公共空间建设,应该将“朴素自然”作为展现和创造城市风貌个性、注重整体感、强调协调性作为一贯理念。认真借鉴岭南园林的造园理念和岭南画派的审美情趣。既讲究因地制宜、天人合一,又强调巧妙构思、功能实用,同时遵循“精通简要”、“画贵简不贵繁,多一笔不如少一笔,意高则笔减”的原则。从而有效避免当今公共空间设计中的同质化现象,有效地丰富空间变化、开掘空间文化、提升空间意蕴,将公共空间的社会功能与赏心悦目的审美意境有机结合起来。“不为无用之高谈空论”的思想浸润着广州人的言行好恶,岭南人对审美和生活关注的是实用性和身心体验,不因雅而废实。广州的公共空间宜自然不宜过分雕琢,因地制宜,因势营造,把握好“自然”与“人工”的精巧运用,尽可能地做到自然协调、恰如其分、各得其彰,不要为了修饰而修饰,使现代公共空间与自然景观、不同时期的建筑融合为一体。

(三)以岭南文化兼收并蓄特性为基本原则

多元包容、兼收创新是岭南文化的生命所在。无论是对内还是对外,岭南文化都呈现出一种兼容的常态,以宽阔的胸怀拥抱东西南北来风,吸纳新鲜空气。

它的兼收包容也浸润着一种世俗化的宽容精神。正是这种兼容的特性,使岭南文化从历代南迁的中原移民和络绎不绝的海外来客身上不断摄取营养。依赖这不竭的营养之流,岭南文化不断地发展,不断地创造着辉煌。取材广博奇杂、技法“有传统,无正宗”的广州美食,以追求清、鲜、爽、嫩、滑为原则,选材用料上无所禁忌,灵活多变地大量引进世界各地的原材料,吸取中外烹调技术精华,不断地移植改造,推陈出新,厨师不论师承,常常能对低档粗贱的杂料用心挖掘、巧手烹饪,同样做成美味精品照登大雅之堂。“折衷中西,融会古今”的岭南画派,主张创新,以岭南特有景物丰富题材;主张写实,引入西洋画派技法;主张博取诸家之长,成为中国传统国画中独树一帜的革命派。“中西合璧、古典与现代兼容”的广式骑楼,是以东方传统审美观念和民族心理对西方建筑文化的重新审视和创造性吸收的成果。这些最体现岭南文化多元兼容之特性的集大成者,也反映出广州人在继承与创新上的务实态度和学习智慧:既不割裂传统,又不死守传统,反对单一性的标准,不失自我又时时兼容创新,使自我常在又常新。

这一开放而又理性的文化精神,目前已经充分地体现在广州经济社会的变革中,这应当反映在广州人在城市建设公共空间的文化意涵建构上,将多样的外来文化与传统文化经过创意融会贯通后变成个性化特征予以呈现和展示。现代经济与科学技术的高度发展,社会发展的日益进步,多样性、外来元素是城市生活的常态,也是城市活力的重要源泉,人们的的生活方式、观念和需求愈加多样化,广州城市公共空间的建设不但需要满足城市景观多样化的要求,还应满足城市居民社会生活多样化的要求,增加公共空间环境的多种文化生活内容和丰富文化内涵,结合城市中心区的地方性和独特的历史文化,创新出能够作为识别城市结构和空间特征与个性的象征性文化特色,以多样而又不失个性的公共空间形式为市民提供不同类型的社会公共活动空间。

(四)以岭南悠久历史文化为呈现内容

历史文化是一个城市的血脉和灵魂。广州是一座具有两千多年历史的历史文化名城,是国务院公布的首批历史文化名城之一。广州自秦汉以来一直是岭南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有着丰富的历史沉淀和浓厚的文化底蕴,有自成体系的独特生活方式,有别具一格的鲜明城市性格,有见证城市发展的文化遗址、历史名胜,有口传心授、传承千年的民情风俗,有在民族或地方发展史上产生过重大影响的历史事件,有在国家或城市发展史、文化史做出过特殊贡献的岭南名人,还有各种岭南文化艺术及其新创作作品的现场展演,这些都应该作为广州城市公共空间建构中要着重展示和表现的内容。只有通过这些载体或符号的呈现,广州城市生命才得以延续,人们才能去了解好认识岭南文化的内涵,才能形成对广州这座城市的集体记忆。

(五)以岭南特色风物为装饰载体

花开络绎不绝,四季佳果纷纭丰盈,是广州与众多城市的显著区别,也是广州一个重要的标识符号。晋惠帝永兴元年(公元304年)含嵇著的《南方草木

状》就说广州的花木“春华者冬秀,夏华者春秀,秋华者夏秀,冬华者秋秀,其华竟岁。”被誉为“花城”的广州,以往有用广州特有的诸如木棉、含笑、白兰等花木装点城市公共空间,甚至还有以树景观识别街道的习惯,如惠福路的榕树、先烈路的木棉树、滨江大道的榕树与凤凰树木等。广州在公共空间建设的过程中,应该继续沿用原有理念和做法,将一些颇具岭南特色的风物进行新一轮的重新挖掘和培育,将公共空间的地域特色和文化意涵重拾和营造。

广州民间还一直存在借花木作为寄情托意的载体,承托美好象征意义,用于家庭或祠堂装饰的风俗习惯。如陈家祠的装饰艺术中,花语的隐喻、花语图例的美学运用就非常广泛,用不同的花种表达各种象征意义:“石榴多子”、“芭蕉叶(业)大”、“竹报平安”、“百年好合”等等,这些反映粤式生活的风俗装饰艺术,引起游人广泛的兴趣,常引来参观者的会心一笑,无疑给这座古宅增添了不少文化韵味和特殊意境。除此之外,广州每年的“迎春花市”上也有不少寄托了百姓对来年美好期盼的植物花木,如“富贵竹”、“开运竹”、“五代同堂”、“一帆风顺”、“鸿运当头”等等,以花语代言寄语反映民俗心理的诉求。广州在城市公共空间的建构中,应该将这些重要的民间习俗予以记载,将一些民间喜好的本土的草木图例广泛地应用于建筑、雕塑、装饰图案中,让人们既能感知本土风物的标识性和亲和力,又能读出公共空间的美好象征和文化意涵。

(六)以岭南特色技艺为装饰手法

岭南建筑在延续中原传统建筑形制和建筑思想的基础上,结合本地的地形和气候条件,充分利用岭南当地的物产,发展出了不少岭南地区非常独特的建筑装饰艺术,如木雕、砖雕、石雕、陶雕、灰塑等等。以陈家祠为例,采用中轴线对称布局的手法,前后三进,包括9座厅堂、10座东西斋、6个庭院,建筑群主次分明,虚实相间,庭院与建筑紧密结合,体现出传统四合院建筑严谨规整的整体美感。祠堂中大量运用木雕、砖雕、石雕、陶雕、灰塑、彩描、嵌瓷、铁铸、铜铸、壁画以及书法对联等艺术装饰,各种装饰工艺充分发挥了材料的性能特质,技法简练粗放,制作却精雕细琢,给人以巧夺天工之感。其建筑与装饰相互映托,相得益彰,庄重淡雅中透出富丽堂皇,显示出岭南民间建筑装饰艺术的精美别致。广州在进行城市公共空间构建时,完全可以采用这些颇具传统的建筑和装饰工艺形式,甚至将之与现代新型材料、新型科技相结合进行进一步创新,使得岭南传统技艺能够带着其深厚的文化意韵,带着其精美细巧的突出文化特色,在现代城市公共空间得到完美展示。

四、城市公共空间建设应促进城市文化发展

刘易斯·芒福德把“文化贮存、文化传播和交流、文化创造和发展,称为城市的三项最基本功能”。^[9]作为城市最重要组成的公共空间,其建设与发展除了要尊重城市的历史风貌和体现地域特色,更重要的是要创新城市文化、延续地方特色和维护城市活力。中国的城市也许可以从巴黎、纽约等文化名城的一些案

例中进行有益借鉴,从公共空间应促进城市文化发展的角度再思考、再定义和再营造,从而使中国城市及其城市文化的影响力、创造力越来越受到国内国际的关注,慕名前来的创业者、投资者、旅游观光者、求学者逐年攀升,使中国更多的城市成长为文化型城市和国际性城市。

(一)增加已有公共空间语境,促进当代城市文化艺术发展

正如法国艺术史与美学博士卡特琳·格鲁(Catherine Grout)在《艺术介入空间》一书中阐释法国的许多皇家广场在经历了封建皇权时代和大革命及共和国时代的过程中指出的那样:“它们都一再经历了客观语境和语意转换的洗礼”。事实上,一成不变的空间性质是不存在的,不同时代的人们对原有公共空间必然进行改换和再造。

位于巴黎市中心的卢浮宫原为城堡,后为皇宫,18世纪末辟为公共博物馆,收藏了大量世界级的艺术精品,成为世界最大、藏品最丰富、影响最大的博物馆。20世纪80年代初,法国总统密特朗决定改建和扩建卢浮宫。他邀请贝聿铭设计的玻璃金字塔,与西侧的土勒公园融为一体,与主体古典建筑对称布局保持和谐,透明的锥体既可解决地下大厅的采光,又可经反射玻璃反映周围建筑物褐色的石头而对旧皇宫沉重的存在表示足够的敬意。自1989年建成以来,玻璃金字塔逐渐成为卢浮宫的标志性建筑,挑剔的法国人也慢慢接受并称赞这一建筑创举。玻璃金字塔成为卢浮宫中与《蒙娜·丽莎》画像和断臂维纳斯雕塑相提并论的观赏热点。据说,三分之二的游客宁愿挤在玻璃金字塔前排长队,也不愿从另外两个入口进馆参观。到上世纪90年代末,玻璃金字塔下方接待区年游客流量就已达500万人次,大大超过400万人次的设计标准。卢浮宫的这次改建既未破坏原有的古典气氛,又充满了现代性和时代感,甚至因为这次大胆而成功的改建向世界宣告了最开放的理念,从而使得越来越多的当代艺术家和当代艺术展走进卢浮宫。古典与现代完美融合,并将城市公共空间对城市文化发展的影响和推动发挥到极致,是卢浮宫经久不衰的秘诀所在。

以广州为例,其中心城区分布了相当数量的历史公共空间,也新建了不少的文化公共基础设施,但极少能在对岭南文化的更新成长过程中发挥卢浮宫这种强大的集聚和推动效应,究其原因就在于这些空间极少能表现出其面向城市未来文化发展的孜孜追求,缺乏一种发自内心的号召力和感染力。广州作为岭南文化中心地,集中了各种岭南文化艺术的创作、研究、交流机构和团体,聚集着大量岭南文化人才及文化艺术信息资源。广州的公共空间特别是公共文化空间,应该义不容辞地承担起传承和光大传统岭南文化,有组织、有规划地推进各种文化资源的整合力度,创新各种文化资源整合再生产的模式,不遗余力地推动岭南文化创作的内容与形式创新,赋予岭南文化以新的时代内涵,丰富岭南文化艺术风格和流派,为岭南文化的持续繁荣和现代化发展注入不竭的动力。

(二)挖潜公共空间的闲置小空间,集中展示和创意发展城市文化

任何一个城市都有历史抑或现代公共空间的闲置或利用不完全,也都有人

文历史资源的闲置或利用不完全,这些“文化存在”如果不在一个城市主题文化形象下进行整合与传播,就将逐渐被淡忘,直至走向消亡。

巴黎塞纳河边沿河分布的900个“绿色书箱”里摆放着等待出售的约30万册古籍,曾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列为世界文化遗产。这道堪称巴黎文化风景线的旧书摊,始于十八世纪法王路易十六时期。政府规定书箱外表必须涂上绿色颜料,每个箱子的规格均一致,因此看上去甚为整齐。政府还严格规定这些书摊只准出售旧书或旧物品,不准售卖新出版的读物,否则会被罚款。在这些旧书摊上,可以看到其中摆着十五世纪以来的各国诗画、书籍、古董,还可以看到半个世纪以前的硬币、明信片 and 邮票。不少学者、研究人员和收藏家都涉足其间,寻找他们所需要的珍品,甚至法国一些城市的图书馆也派专人前来这里,购买他们认为有价值的古书。旧书摊的经营者,他们学识丰富,随便拿起一幅古画或一枚邮票,都可以给你讲一个很长的故事。故有人把塞纳河畔的旧书摊称为小型古典图书馆和袖珍博物馆,把书商称作“历史的教科书”。

比如广州,完全可以借鉴巴黎的经验,将珠江两岸逐渐打造成文化公共空间,为广州的“图书馆之城”和“博物馆之城”建设另辟蹊径。甚至还可以将这种经验推而广之,由广州市的文化主管部门出台有关政策,一是将公共空间内的闲置空间,免费或低租金提供给一些文化社团,打造成岭南文化的展示场所;二是对于个人或企业愿意利用自有物业开办岭南文化展示场馆的予以扶持或补贴,三是对于在这些以文化展示为主业配套兼营酒水的场馆给予免税,从而鼓励街角画廊、角落书店、文艺咖啡馆、美学茶铺等非传统场域将地方文化进行创意展示,让市民和游客有更多的第三空间公共场域去享受文化和创“艺”。这样一来,既能满足市民的文化需求,提高市民文化品位和美学素养,凝聚市民认同;又能使这些场所成为培育岭南特色文化创作和观光的全新公共空间,为聚集和培养文化创意人才提供平台。

(三) 选定再利用价值高的旧厂房街区,稳定保育文化创意产业发展

查尔斯·威尔士王子在《不列颠观察》中说道:“我认为如果一个人忘记了过去,那么这个人也就丧失了灵魂,同样的道理,如果我们在城市开发的时候对过去的风格、模式进行了全面否定,那么开发出来的建筑也必定缺乏灵魂”。工业的发展曾经极大推动了广州的经济和社会发展,当她由工业时代步入信息时代后,老旧的工业建筑不再浓烟滚滚时,“那些在后工业时代改造后的旧厂房却能以其高大的空间和充裕的面积为正在形成的新型生活方式提供理想的场所”。^[10]因为它们经历和见证了城市工业文明的发展,记载着城市经济和社会进步的足迹,其中蕴含巨大的历史文化价值是其它类型的建筑所不能替换和代替的,在经过恰当的改造后能华丽转身为最刺激城市新锐文化生长的、充满文化活力的场所。1973年,美国的老工业区SOHO区被政府批准为历史保护区,这是世界上第一个由工业区演变来的历史保护区,SOHO区的艺术家们通过自己的行动使人们逐渐认识到了旧厂房等建筑遗产的价值。此后越来越多欧美发达国家

家的著名建筑师专注于旧工业建筑再利用的设计与研究,并有不少优秀作品出现。世界上一些知名城市都形成了各自独特的包含大量旧工业建筑的区域,例如纽约的CHELSRA区、柏林的西莫大街、伦敦的EAST-END等等。

作为我国最重要的都市群之一的珠三角都市群的中心城市,广州无论是在保护工业文化遗产,还是在推进岭南文化都市化和产业化方面都必须承担率先垂范和积累经验的历史重任。目前广州虽然也已经在“三旧改造”、“退二进三”的政策下出现了不少文化创意产业园区,但这些对旧厂房的改造和利用基本都是临时的,三五年后仍旧难以摆脱被拆除重建的命运。而且由于多数是民营企业为短暂的盈利而投资改造,并未有政府在正式规划上的认可和氛围上的营造,这些园区的文化气息与国外成熟的艺术商业区差距较大,对广州文化创意产业的培育和文化创意产业人才的聚集作用发挥还较为有限。广州既然已将建设世界文化名城作为城市发展的一个终极定位,就应该在培育文化创意产业的发展方面有更加积极的作为,通过对历史工业建筑街区的保护和有前瞻性的规划指引,促进文化与现代科技融合,创新文艺传播方式和手段,培育新的文化业态,同时注重城市人文生态的平衡,发展特色城市文化,张扬城市文化个性,营造新的城市亮点,提升城市的文化竞争力。

注释:

[1]高小康:《都市发展与公共空间建设》,《世博会与都市发展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2010年10月29日。

[2]《列宁全集》第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84年,第276页。

[3]张鸿雁:《城市空间的社会与“城市文化资本”论——城市公共空间市民属性研究》,《城市问题》2005年第5期。

[4]姚依民:《浅析梁启超图书馆学实践对我国近代图书馆事业的影响》,《咸宁学院学报》2011年第5期。

[5]司徒尚纪:《建立“岭南学”繁荣岭南文化》,《岭南文史》1995年第2期。

[6]李权时:《论岭南文化工具主义——兼论岭南文化的现代转换》,《广东社会科学》2009年第4期。

[7][丹]扬·盖尔:《交往与空间》,何人可译,北京: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1992年,第140页。

[8]转引自阳建强、吴明伟:《现代城市更新》,南京:东南大学出版社,1999年,第136页。

[9]刘易斯·芒福德:《城市发展史——起源、演变和前景》,宋俊岭、倪文彦译,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2005年。

[10]冯·格康:《建筑和可持续性》,《世界建筑》2004年第4期。

[责任编辑:书缘]